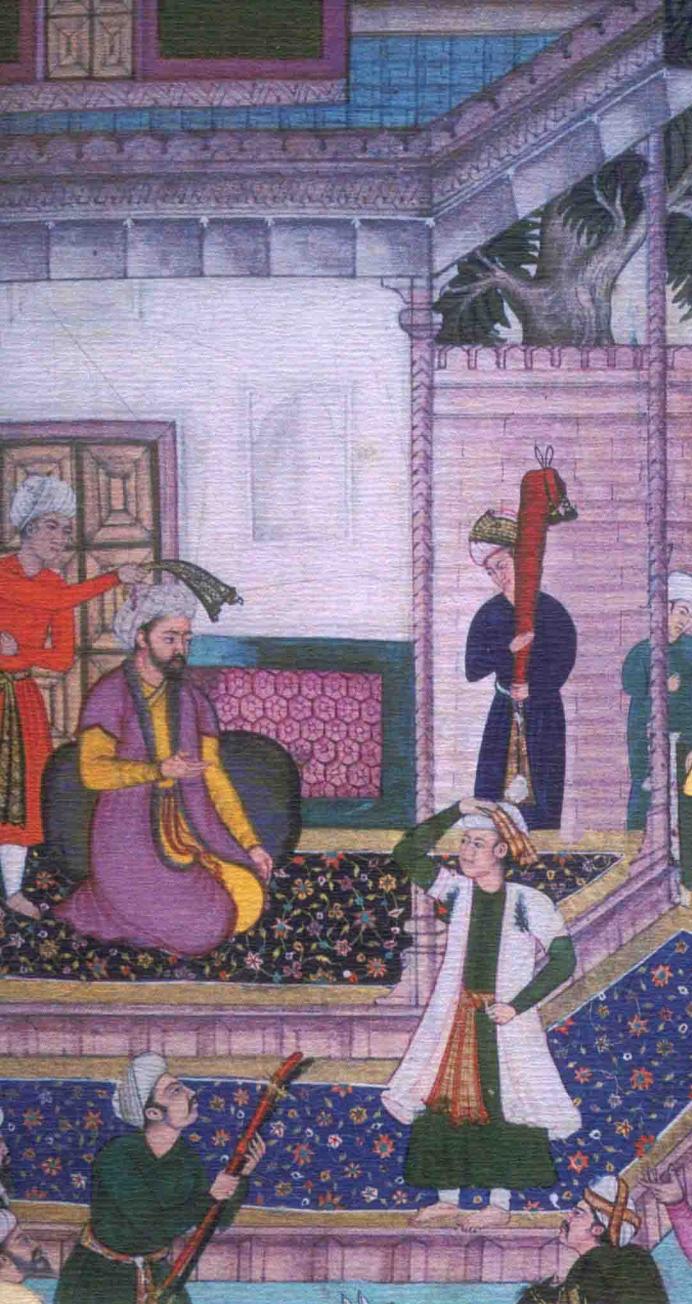


VOLUME II 第3冊

伊斯蘭文明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中卷



MARSHALL G. S. 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長寬 審訂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伊斯蘭 文明

中卷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第3冊
建立國際文明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

伊斯蘭文明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中卷第三冊

作者	馬歇爾·哈濟生 (Marshall G. S. Hodgson)
譯者	高慧玲／戴以專
發行人	王春申
編輯指導	林明昌
營業部兼任 編輯部經理	高 珊
主編	王窈姿
責任編輯	黃楷君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	徐 平
印務	陳基榮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3號8樓
電話	(02) 8667-3712 傳真：(02) 8667-3709
讀者服務專線	0800056196
郵撥	0000165-1
E-mail	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	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	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6 年 01 月

定價：新台幣1500元（套書上下冊不分售）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UME 2: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ISBN 978-957-05-3026-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001	第三冊 建立國際文明
017	第一章 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 945–1118 CE
097	第二章 社會秩序： 商業利益、軍事勢力與自由
229	第三章 知性傳統之間的成熟與對話 c.945–1111 CE
307	第四章 修道團體的蘇非主義 c.945–1273 CE
391	第五章 新順尼國際主義的勝利 1118–1258 CE
449	第六章 波斯文藝文化的綻放年代 c.1111–1274 CE
507	第七章 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文化模式化
568	重要詞彙與人物表
582	地圖重要詞彙
601	索引

LIST OF CHARTS

- 012 [序言] 表1 伊斯蘭中前期：與歐亞非舊世界的事件對照表，
西元950～1250年
The Islamic Earlier Middle Period, 950 – 1250 CE,
with Reference to Events in the Oikoumene
- 082 表1-1 對照年表：進入中期時的轉變，西元945～1118年
The Transition into the Middle Periods, 945 – 1118 CE
- 088 表1-2 個別政權年表，西元945～1118年
Chronology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945 – 1118 CE
- 304 表3-1 穆斯林純文學家、科學家與哲學家，西元945～1111年
Muslim Belles-Letterists, Scientists,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945 – 1111 CE
- 306 表3-2 穆斯林密傳菁英主義的類型
Types of Muslim Esoteric Elitism
- 387 表4-1 道團及其創立者的起源，西元945～1273年
Filiation of the Tariqahs and Their Founders, 945 – 1273 CE
- 388 表4-2 中前期的蘇非行者，西元945～1273年
Sufis of the Earlier Middle Period, 945 – 1273 CE
- 444 表5-1 順尼勝利的時代，西元1118～1258年
The Age of Sunni Triumph, 1118 – 1258 CE
- 503 表6-1 至西元1291年的古典波斯純文學以及一些阿拉伯作家
The Classical Persian Belles-Letterists to 1291, with a Few Arabic Writers
- 505 表6-2 中前期的穆斯林哲學家與神學家，西元1111～1274年
Muslim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in the Early Middle Period, 1111 – 1274

LIST OF MAPS

- 025 圖 1-1 法蒂瑪朝的時代
The age of the Fatimid Dynasty
- 035 圖 1-2 西地中海地區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 040 圖 1-3 薩曼朝、布伊朝與喀喇汗國
Sâmânids, Bûyids, and Kara-khanids
- 049 圖 1-4 嘎茲納朝與塞爾柱帝國
The Ghaznavids and the Seljuk empire
- 116 圖 2-1 歐亞非乾旱帶到南部海域的貿易路線
Trade routes through the Afro-Eurasian Arid Zone
and the Southern Seas
- 400 圖 5-1 十字軍時期的敘利亞與安那托利亞
The Crusading period in Syria and Anatolia
- 411 圖 5-2 穆拉比特朝和穆瓦希朝
The Murâbîts and Muwahhids
- 420 圖 5-3 十三世紀早期的伊斯蘭中土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 in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 436 圖 5-4 十三世紀中葉的蒙古擴張
Mongol expansion, mid-thirteenth century
- 440 圖 5-5 伊斯蘭擴張至西元 1520 年
The spread of Islam to 1250

BOOK THREE

建立國際文明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

在最後、唯一的真理面前，其餘所有的真理都是其追隨者，雖然每項真理在其所屬的領域中，本身皆蘊涵真實的要義；但在最後、最終真理的底下，它只是一名追隨者。——伊薩克·潘寧頓（Isaac Pennington）

伊斯蘭歷史（Islamicate History）中期

在西元945年以後，古典阿巴斯朝（‘Abbāsī）時代最獨特的特徵，連同其宏偉的哈里發帝國及阿拉伯語言文化都逐漸改變，其變化的幅度之大，讓我們因此必須把它區分為另一個全新的大時代。在穆各塔迪爾（al-Muqtadir）的時代（西元908～932年）裡，仍然能夠輕易察覺曼蘇爾（al-Mansûr）、哈倫·拉胥德（Hârûn al-Rashîd）、瑪蒙（al-Ma'mûn）時代的輪廓，但是在五、六個世代之後，這個世界的輪廓已經逐漸模糊。巴格達（Baghdad）漸漸淪為地方上的城鎮，而「哈里發政權」（caliphate）這樣的名稱最後也消失無蹤。西元945年之後的五個世紀裡，那持續擴張、由許多獨立政權統治，而且在語言與文化上都充分國際化的社會，取代了先前的哈里發政權。這個社會並非由單一政治秩序或文化語言維繫，但它依然自覺地共同經歷其獨特的歷史進程。在當時，這個國際化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的確在世界上的分佈最廣且影響最大。（在後面的說明中，我們會把大約西元1250年之前的時期稱為中前期，而之後至西元1500年左右的時期，則稱為中後期）。

現存的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共同形象大都成形於中期年代——也就是在尼羅河至烏茲河之間的地區，伊斯蘭以前的傳統消失之後的時期（隨著受保護者〔dhimmî〕人口跌落為顯著的少數群體身分）、其中一個西方（Occident）地區因為基本的社會變遷而使得歐亞非舊世界（Oikoumene）脈絡（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於焉成形）開始瓦解之前的時期；狹義地說，這個時期所指的時代介於古典哈里發帝國崩解的十世紀中期和十五世紀末之間。這段時間在哈

里發帝國的庇蔭下，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逐漸成形，而到了十五世紀末，並隨著西方航海時代開始，也首次宣告著新世界的地域平衡局面已經來臨。透過歷史中期成形的哈里發政權形象，可以一窺哈里發政權的極盛面貌；這些哈里發帝國文化中的元素通常被視為後代作家據以為實的基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長久以來所關注的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獨特議題，其實都只著重在歷史中期，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合法性、美學創造力、宗教理解中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與內在性（*immanence*），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社會角色等問題。

這種檢視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的方式並非全然合理。到了哈里發盛期末年，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仍在成形階段，一方面希望更多人能皈依伊斯蘭，一方面也將伊朗—閃族傳統（*Irano-Semitic tradition*）轉變成新的形式，而這種形式一直到了西元945年之後才足以傳播到廣大的西半球區域。到了十六世紀，撇開初次瞥見西方時代即將來臨的事實，伊斯蘭世界（*Islamdom*）的一些全新趨勢早已多方進展到某個階段——至少在當時形成的三個主要帝國——而在這個階段的許多方面，我們在歷史中期開始時所看到的問題，至少也已改頭換面；甚至在隨後的十八世紀來臨之前，早已被歐亞非舊世界的全新激進情勢所取代。中期所形成的統一性，包含徹底經歷伊斯蘭（*Islamicate*）生活的各個不同時代。但務必了解：十三世紀中葉之前的中前期與中期後歷史形勢，已經因為蒙古人征服後推行新政治資源，而有相當顯著的差異；之前正逐步擴張的中國經濟突如其來的崩壞，則造成——或者說反映出——乾旱地帶中部（mid-Arid Zone）繁榮貿易日漸式微了。中後期已經具備十六世紀嶄新局面的完

整雛形。

中前期是相對繁榮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形態到了宋朝（大約始於哈里發盛期結束之際），已經從早期注重拓展商業逐漸轉變至全面性工業革命初期階段，其中某些地區的工業投資更快速且急遽地增加，北方地區尤其如此，而新的技術在南方更促使農業生產力呈倍數成長。隨著開採新礦，中國的黃金供給大幅增長，它在南部海域（印度洋及其東鄰近海域）的貿易自然在質與量上都增長了；可以想見在某種程度上，對黃金供應量上升的反應可歸因於中國的緣故，而在其他地方，商業與都市活動的步調也不斷加快，其中最特別的是歐洲西方世界，藉由使用板犁（mould-board plough），不斷在寒冷且泥濘的北方加速開發農業。在這種情形下，仍位於西半球商業路線交錯之處的伊斯蘭地區（Islamicate land），他們必須確立比農耕還要更加強韌的商業取向；就商業本身來說，這種結果最後未必最為有利，但最終將使穆斯林得以展現其強大又廣闊的社會秩序。

不穩定的農業（agrarianate）繁榮

具備多樣性、差異性且個人能表現自我的社會制度，才能提升社會中的文化表現。而制度上的差異化則需要依靠高度的投資，這不只是指一般經濟意義上的投資，還須包括人工時間的投資—專業分工與對專業的關注—例如，進行科學上的長期研究等。但高度投資更須以繁榮為前提，所謂繁榮不只是農民吃飽喝足而已（儘管這終究是關鍵），還必須包括可供其他階層使用的可觀盈餘，讓他們能同時擁有資金與閒暇，以滿足其個別需求。如此一來，儘管繁榮並不能確保

文化創造力，但終究是保證文化創造力的前提。

歐亞非舊世界局勢所營造的繁榮和創新，讓穆斯林有機會因此能充分蒙受其益，但是與任何農耕型態的社會一樣，總有一些限制存在：也就是說，任何榮景都有不穩定的時候，而且，以永續繁榮為目標的制度本身就錯綜複雜，所以，若高出最基本的制度需求，繁榮就會變得不穩定。一旦在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上維持都市與農村的共生關係，通常農業的運作也就幾乎無法避開都市產品、甚至是都市管理活動的干預，而除了普遍性的自然災害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變遷會使社會衰退到更加簡陋的層次上。然而，許多事件都可能摧毀這種超出層次的複合性，也就是社會中形成的任何無形或有形的複雜制度；還可能迫使社會（至少在局部性上）衰退到更接近都市農村共生關係的基本經濟水準上。

來自經濟落後地區（其主人並不打算維持複雜制度所依賴的微妙期望模式）的大規模入侵，可能會降低知識及經濟方面的投資水準，而且，如果這個地區尚未進步到具有足以超越落後地區人民的強大力量，也會使高度開發地區在制度層面上的複雜程度隨之降低。吉朋（Gibbon）以農業來比較羅馬帝國的困境和他那個時代的西方世界時，就指出了這一點，而且，除非具備西方世界的技術水準，否則無法征服吉朋當時所處的西方世界。吉朋還指出，內在壓力可能也會減低制度層面的複雜程度。精神、社會或政治上的失衡，都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削弱統治階級菁英及其優勢文化：它們可能在沒有特權的階級中公開招致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可能表現在人們遵從大眾標準的社會或精神趨勢上，以及表現在人們直接反抗這些趨勢上；他們也可能會導致統治菁英階層內部的癱瘓，進而加速政治上的崩解及軍

事上的破壞。接下來就可能會出現軍事政體，在軍事勢力所及之處實施專制統治，而且處於無政府的邊緣狀態，這些全都無法維護制度間的微妙平衡。

歷經多次征服以及相當嚴重的國內緊張氣氛，複雜的制度仍可能存續，而且戰爭的蹂躪或施政失當所造成的損害並非長期持續不斷，相反地，這些損害多半得以復原。但長期而言，這類復原能力必須仰賴高度的繁榮，而繁榮又取決於本身未必能永續的諸多有利情況之間的平衡。過多的政策失敗就可能足以抵銷一般性施政失當的相關資源。以任何方式干擾這種平衡狀態，都會降低社會的複雜程度，或者至少在局部情況下，也可能會使其衰退到農業（agrarianate）秩序社會中的最低經濟基準。

在某種程度上，在中期伊斯蘭世界的某些期間與地區，人們確實察覺到這種農業層次（agrarianate-level）繁榮的不穩定性。整體而言，尤其是在中期的後段年代，伊斯蘭世界許多地區的繁榮明顯衰退，因此要進一步發展複雜的制度時，就會受到限制。雖然確實出現某些衰退情況，也許，歷史學家對「整個中期持續存在的普遍性衰退」印象並不正確，但我們目前握有的證據還太少，並不足以精確界定這段歷史。無論如何，中期前半段在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領域內，顯然並沒有任何經濟擴張能夠與西歐或中國所出現的經濟規模相比擬。這個事實讓研究這個社會的學者必須面臨兩個問題。首先，在許多情形下，重大的政治問題必定是：如何面對政治崩壞的固有威脅？其次，如果我們要探索半球經濟活動是否出現過任何普遍性的成果，則通常必須探討在中部乾旱地帶所推動的社會取向，而非探討投資與制度上等整體或更高層次的差異性。

儘管這類問題必定會被反覆提及，但經濟上的不穩定畢竟迥異於普遍性的經濟衰退。能記載下來的經濟衰退通常是局部性，而非普遍性的衰退。而且，任何經濟衰退對文化活動和複雜制度所產生的影響，都可能只是暫時性的；如果新的（較低層次的）資源基準已經穩定，那麼以此為基準的經濟繁榮又能再次成為有效的文化活動基礎。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伊斯蘭世界的某些地區，經常都能有效發展出高度的繁榮。即使在最不昌盛的時期和地區，也都幾乎未曾完全退回到農業經濟（agrarianate economy）的基準上，甚至還出現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同時，在中期的某些時代，伊斯蘭世界裡的某些地區確實非常繁榮，即使這樣的繁榮有時是建立在不如以往的基礎上。這種繁榮帶來高度創造力，其程度或許至少相當於：在現代技術時代（Modern Technical Age）之前的舊世界絕大多數時期和地區。

論文化一體性

西元950年到1100年之間，中期的新社會逐漸成形。就中期各年代本身而言，古典阿巴斯朝模式崩解的時期可以說是制度化的創造時期。到了十二世紀初期，就已經奠定了新秩序的主要基礎，而在西元1100年到1250年間則更加成熟發展，逐漸在其最獨特的活動領域中臻至顛峰。

這個社會既單一又多元。哈里發政權衰微以後，隨著伊斯蘭世界迅速擴張，包括巴格達在內，沒有任何城市能夠保有文化上的核心角色。伊斯蘭正是在此一時期開始擴張到整個西半球：進入印度與歐洲，沿著南方海域的海岸到整個北方草原。不同穆斯林地區之間的差

異性相當大，每個地區都有其本身的伊斯蘭思想（*Islamicate thought*）學派和藝術派別等等。而遠西地區、西班牙與北非（*Maghrib*¹），則通常是由分裂自北非（*Maghrib*）內陸的柏柏部族朝代所統治；這些政體具有共同的歷史，並發展出以源自格拉納達（*Granada*）阿罕布拉宮（*Alhambra*）聞名的藝術，以及伊本一圖非勒（*Ibn-Tufayl*）、伊本一魯胥德（*Ibn-Rushd*，即阿威羅伊〔*Averroës*〕）的哲學學派。埃及、敘利亞以及其他阿拉伯東部的地區，則是由開羅的強大朝廷加以統一；當伊拉克隨著蒙古人的征服而沒落之後（十三世紀中葉），這個區域終於成為獨具一格的阿拉伯文學聖地。伊朗人的政體發展出波斯語，作為其主要文化媒介，該政體更與哈里發盛期的標準斷然分離，從它華麗的詩歌即可見一斑。西元1000年之後不久，對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抱持開放態度的印度穆斯林，也開始使用波斯語，但他們也旋即在政府、宗教及社會階層方面，發展出他們本身的傳統、朝聖活動和文學中心。分布在歐亞草原上、更北邊的穆斯林，與活躍在印度洋周圍的南方穆斯林商業國家一樣，也幾乎塑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

但不能就此視為文明斷裂成眾多個別文化。因為這個文明透過共同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模式而彼此連結，並且藉由讓社會任何部門的成員能接納其他地區的成員，以確保理念與禮俗能流通於整個地區，穆斯林總是認為自己就是整個伊斯蘭境域（*Dâr al-Islam*）的公民，是各類藝術與科學的代表性人物。他們隨著寬宏大量或刻薄

* 1 編註：「*Maghrib*」意為「西方」，指的是西伊斯蘭世界，也就是今日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包括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在翻譯時為求文意通順，視情況改譯為「北非」，並標註（*Maghrib*）。

統治者的召喚或壓迫，在穆斯林領土上隨意遊移，而且，在某個地區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人物，在其他地方也就會很快獲得認同。如此一來，地方性的文化潮流就會持續在全穆斯林世界下的事理概念中，受到限制及啟發。因此，藉由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共同交流，就能持續發展出單一文化體，而這個文化體是由具有相互關聯性的傳統所構成。甚至當人們不只使用一種語言，而且在伊斯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阿拉伯語文也被限縮在專業化的學術用途上；不僅是作為文化對話的伊斯蘭本身，而且在它的庇蔭下，大部分對話更重新集中在阿拉伯語文中，持續發揮作用。

但這個擴張的中期伊斯蘭世界在許多文化的面向上，並不像以往哈里發盛期所統治的大部分伊斯蘭世界那樣，保有其一致性。整個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最初曾經歷伊朗—閃族社會的階段（位於尼羅河與烏滻河之間），當時的日常文化模式以村莊和城鎮生活為基礎。相較於這個地區大多數的日常生活傳統，我們在伊斯蘭文學傳統（Islamicate lettered tradition）或其他上層文化傳統中，更可以察覺到其掙脫了過去的束縛；然而，伊朗—閃族上層文化傳統中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所形塑的延續部分，總是受到較次級、且地區性日常生活傳統的滋養。但隨著伊斯蘭世界全面擴張到尼羅河和烏滻河間以外的地區，便出現更全面性的文化斷裂。新穆斯林地區與原來的伊朗—閃族土地之間日常文化的共通性愈來愈少。不僅語言和料理或建造房屋等家庭生活模式迥異，而且連農業技術等結構性特徵，甚至是行政與法律實務也都各不相同。

這時，整個伊斯蘭世界並非承載了整個伊朗—閃族社會複合體，而是伊斯蘭化的伊朗—閃族上層文化傳統；或許在承載了其兩種主要

語言之後，即可稱之為「波斯—阿拉伯」（Perso-Arabic）傳統，因為每位具備伊斯蘭（Islamicate）嚴謹文化素養的人都至少能精通其中一種語言。這麼多地區的民族所加入的國際性統一群體，都能保有其獨立的日常生活，但卻同處於波斯—阿拉伯的上層文化層次上；其標準會影響、甚至也會逐漸修正日常生活文化，雖因地區而異，此一文化基本上仍是印度文化、或是歐洲文化、南方文化、北方文化。

事實上，即使在尼羅河至烏茲河之間的地區，各種地方文化模式之間也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伊斯蘭單一性（Islamic unity）的優勢也僅限於地方性的日常生活層次。無論在阿拉伯半島本身，或在這個半球最遙遠的角落裡，禮俗慣例和書本上伊斯蘭法（*Shari‘ah*）之間的距離，可能一樣遙遠。不過，在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中，伊朗—閃族中土仍然清晰可辨。相較於波斯—阿拉伯傳統區域與過往上層文化的斷裂，且和日常生活層次的文化也幾乎沒有因緣關聯，伊朗—閃族中土的伊斯蘭社會（Islamicate society）及其特有的高階文化，由於和當地環境以及模式之間的原初關係，因此能根深柢固存在於地方上。我們可以將這個中土稱為「舊伊斯蘭地區」，儘管重點不是伊斯蘭在當地的優先性，而是它與更早期傳統之間的連續性；北非（Maghrib）的伊斯蘭幾乎與尼羅河至烏茲河間地區的伊斯蘭一樣古老，然而，比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更早出現在當地的拉丁文化並無太多的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的痕跡，因此，北非（Maghrib）並不能視為其核心領域中的一部分。一般都認為在整個中期時代，尼羅河至烏茲河之間的領土在伊斯蘭世界一直主導其文化優勢。來自更外圍地區的穆斯林以自己曾在那裡遊學為榮，而且，來自這些領土的移民畢竟至少以某種波斯語或阿拉伯方言為母語，所以在別處享有聲

譽。即使居民並不遵循中土的社會模式和文化創新，但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時，充分徵顯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的中期年代，則經歷了文化上的兩種衝擊：儘管有著相當程度的繁榮，但其上層文化屢受威脅，主要是社經投資逐漸朝向最低層次的農業（agrarianate）社會衰退，而在尼羅河至烏滌河之間的地區以外，日益遼闊的伊斯蘭世界裡，伊斯蘭上層文化（Islamicate high culture）總是帶有幾分外來元素。這些事實顯露出潛在問題，或許對研究歷史中期的學者而言，這並非不是最重要的歷史課題，但卻始終無法迴避：究竟為何文明會出現這種缺陷？而且，儘管存在這些缺陷，但這些時期伊斯蘭出色的文化活力、勢力，以及無所不在的伊斯蘭文明（Islamicate civilization），又為何能以伊斯蘭豐饒的創新文化之名，廣佈整個東半球呢？